

目 錄

自序	3
前言	12

1950年以前 邊陲歲月

16	第一章 嶺南邊陲 宋皇臺史跡與官富寨 的軍事使命
36	第二章 清代城寨 主權的象徵與條約下的 孤島
60	第三章 戰亂與庇護 難民潮與社區的雛形

1950-1980年 異質空間

80	第四章 建築奇觀 民間智慧的極致呈現
108	第五章 社區網絡 教會、樂善堂與民 間自救
128	第六章 天空無界限 啟德機場與區域的共 生傳奇
148	第七章 「黑暗之城」 國際凝視與流行文化 的誕生

1980年至今 遺產歸途

166	第八章 落幕與新生 聯合清拆、寨城公園 與區域轉型
186	第九章 市井與活力 九龍城與土瓜灣的庶 民生活圖景
210	第十章 記憶與未來 啟德新都會、文化符 號與旅遊願景

附錄	222
參考書目	234
後記	244
鳴謝	246

前言

在華南沿海的漫長歷史中，九龍寨城是一個無法被簡單定義的地方。它曾是帝國的邊防前哨，見證了宋末二帝南逃的悲愴；它曾是清帝國宣示主權的石砌城池，在殖民者的步步進逼下倔強地矗立。1898 年之後，它成為條約體系中的一處「飛地」，在法律夾縫中演化出一個令世界驚嘆的傳奇。1994 年，它的實體被推土機夷平；1995 年，一座江南園林在其廢墟上重生。

單是對這個地方的稱謂，已隱藏着一段複雜的歷史線索。歷代文獻及民間對它的稱呼——九龍寨城、九龍城寨、城寨、城砦、砦城——看似混用，實則暗含了它不同歷史時期的功能轉換與身份認同。「寨」與「砦」二字，在古代漢語中本可互通，均指防禦性的營壘或柵欄。《說文解字》釋「砦」為「籬落也」，引申為軍隊駐紮的簡陋營地。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清廷正式築城，一座擁有城牆、城門、衙署、炮台的完整城池拔地而起——此時此地已從簡陋的「寨」升級為正規的「城」。官方文書因此稱之為「九龍寨城」，以凸顯其城池的規格與主權象徵的意義。然而歷史的弔詭在於，這座象徵主權的城池，在 1899 年後落入中英管治的縫隙之中，反而陷入了無序的擴張。隨着難民湧入、樓宇自行「生長」，它不再只是一座「城」，而是成為一個自成一體的聚落——九龍城寨，或簡稱「城寨」，成為二十世紀最廣為人知的稱謂。這個微妙的名詞轉換，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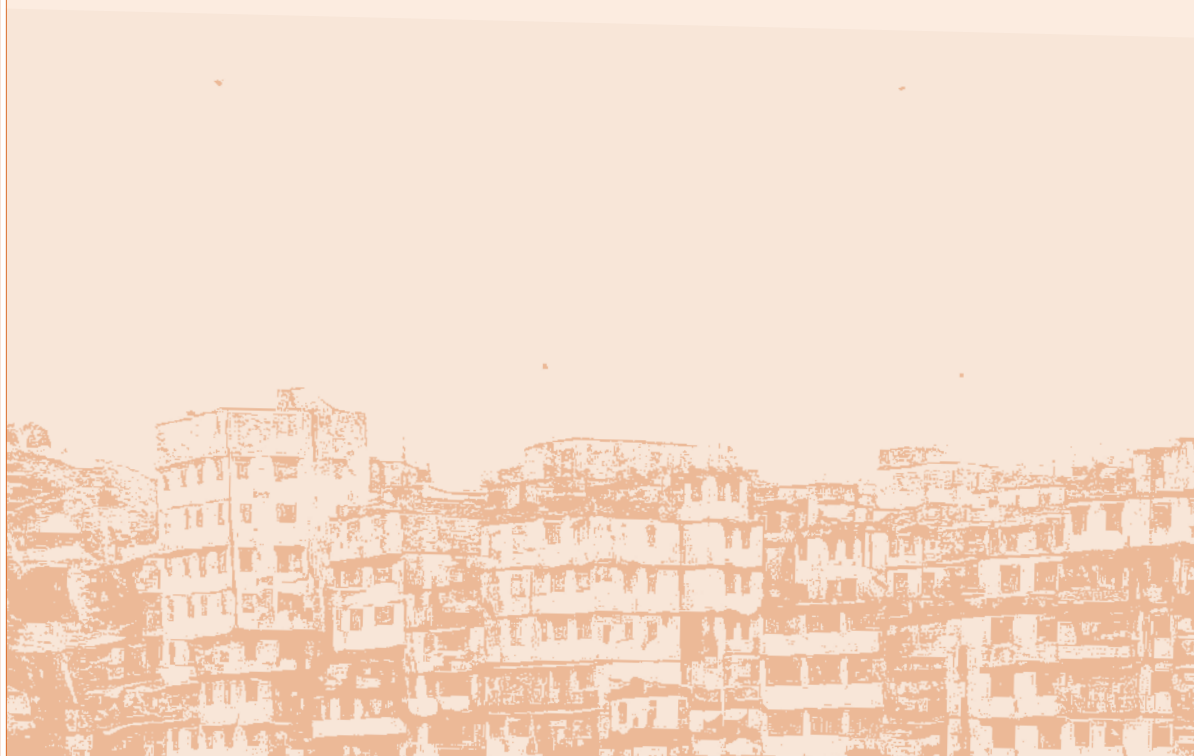
「砦」到「寨城」再到「城寨」，恰恰記錄了它從帝國邊防要塞，到主權象徵，再到非正規聚落的歷史軌跡。

本書以《九龍寨城：從邊城到庶民社區的歷史傳奇》為題，正是希望超越外界的獵奇目光，將這段錯綜複雜的歷史予以系統梳理。全書共十章，按時間順序展開。第一章〈嶺南邊陲〉追溯寨城從宋元邊陲、明代衛所到清初遷界的歷史淵源，為讀者建立最初的歷史與情感連接。第二章〈清代寨城〉記述清廷築城及 1898 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簽訂，揭示寨城特殊地位的法律根源。第三章〈戰亂與庇護〉聚焦 1899 年英軍進佔、1948 年「九龍事件」及戰後難民潮，呈現寨城如何在動盪時代成為流離者的庇護所。第四章〈建築奇觀〉剖析寨城如何在無規劃狀態下「生長」為全球密度最高的建築奇觀，展現草根社群的生存智慧。第五章〈社區網絡〉記錄教會、樂善堂等民間組織如何在權力真空中維繫社區倫理，是寨城「黑暗中的光」。第六章〈天空無界限〉記述啟德機場與周邊社區的共生關係——飛機掠過屋頂的奇觀、噪音下的生活、「小泰國」的誕生。第七章〈「黑暗之城」〉探討國際媒體、外籍攝影師、香港電影及電子遊戲如何將寨城塑造為全球流行文化中的傳奇符號。第八章〈落幕與新生〉記述中英聯合清拆協議、居民安置及九龍寨城公園的設計理念，見證寨城從廢墟到園林的轉化。第九章〈市井與活力〉將



視野從寨城內部轉向周邊，記錄九龍城與土瓜灣的庶民生活——老店、車房、工廠、屋邨的日常。第十章〈記憶與未來〉展望啟德發展計劃、寨城作為文化符號的持續復活，以及文化旅遊的未來願景。

但願本書能為讀者打開一扇理解九龍寨城的窗口——它不僅僅是一個「三不管」的黑暗傳奇，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華南邊陲的歷史沉積、現代化進程中的邊緣人群，以及一個社區如何在最不可能的條件下，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秩序與生機。



1950 以前

邊陲歲月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第一章

嶺南邊陲

宋皇臺史跡與官富寨的軍事使命



今日九龍寨城公園綠意盎然的草坪下，靜臥着一塊斷裂的石碑，其上「九龍寨城」四字，雖歷經風雨，但筆力猶存。這方石碑，如同一把鑰匙，開啟的並非一座尋常中國城池的歷史，而是一段長達近百年、糾纏於帝國餘暉與殖民秩序之間的獨特傳奇。它的故事，始於清朝鞏固海疆的雄心，卻在 1898 年一紙條約簽訂的瞬間，被賦予了全然不同的命運軌跡——從一個主權清晰的軍事前哨，驟然淪為國際法理上的「模糊地帶」，為二十世紀那座聲名狼藉的「黑暗之城」埋下了最初的伏筆。

本章將沿着這條線索，追溯九龍城從官富鹽場到官富寨、再至清代寨城的歷史轉化，並探討宋皇臺所承載的正統記憶如何在過程中賦予此地深層的文化象徵意義——兩條脈絡交織，共同奠定了今天「九

龍寨城」的根基。

第一節 宋元時期的九龍城：
官富場、流亡行朝與宗族移民

在香港九龍灣畔的現代化樓宇與道路之下，埋藏着一段深遠的邊陲史。今日九龍城地區的歷史雛形，可追溯至宋元之際。宋代時，九龍城一帶稱為「官富場」，位於今日九龍東南沿岸（今日尖沙咀與茶果嶺之間），是當時廣州府東莞縣所屬的官方鹽場，亦為廣東地區十三鹽場之一，更是閩粵之間的交通要地。¹ 官富場因官富山而得名，為南宋政府在廣東東莞設立的四大鹽場之一，隸屬於廣東鹽課提舉司。² 它不僅是食鹽生產基地，更掌管鹽稅徵收與鹽貨專賣，為宋朝在嶺南地區的重要財政收入來源。元朝時，「官富場」改為「官富巡檢司」，地域應為今九龍灣西北及西南沿岸，自啟德機場西北角以南，下至土瓜灣一帶，以至尖沙咀等地；明朝保留「官富巡檢司」，設有巡檢、司吏各一，並駐弓兵五十名，以打擊販賣私鹽；³ 至清朝時廢置，而「官富場」一詞也成為今日「觀塘」名稱之起源。⁴

宋末行朝：從官富場到淺灣的流亡之路

南宋景炎元年（1276 年），元軍攻陷南宋都城臨安。年幼的宋端宗趙昞（亦稱帝昞）及其弟趙昀，在陸秀夫、張世傑等忠臣護衛下一路南逃，⁵ 退守至廣東一帶。景炎元年十二月，端宗抵達廣東惠州甲子門；翌年（景炎二年）二月，元兵攻廣州，許多郡縣投降，其後端宗等移駐梅蔚；⁶ 四月，進駐今日九龍城以南的「官富場」地帶，建立了宋末海上行朝；⁷ 同年九月，元兵進擊，帝昞等轉移至淺灣（今新界荃灣），其後再逃往秀山（今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⁸ 《大清一統志》載：

「官富巡檢司在新安縣東南八十里古官富場，明洪武三年置。宋史：『景炎二年，帝舟次於官富場』，即此。」⁹ 這段史事說明，官富場不僅是經濟機構，更一度成為南宋流亡政權的臨時駐蹕之地。

雖然至今缺乏直接證據，但宋末二帝曾駐留九龍城一帶，可從不同古蹟中推斷。位於九龍東部（即昔日官富場一帶）的佛堂門，是進出官富場的必經之路，其大廟灣天后廟的「南宋石刻碑文」有相關記載：

古汴嚴益彰官是場。同三山何天覺來遊兩山，攷南堂石塔，建於大中祥符五年。次，三山鄭廣清堞石刊木，一新兩堂。續，永嘉滕了覺繼之。北堂古碑，乃泉人辛道朴鼎剏於戊甲，莫攷年



佛堂門大廟灣石刻有關宋朝「官是場」的記載。

號。今三山念法明、土人林道義繼之。道義又能宏其規，求再立石以紀。咸淳甲戌六月十五日書。¹⁰

此石刻於南宋咸淳甲戌年間（1274年），為香港最早有紀年的刻石，文中「古汴嚴益彰，官是場」——「官是場」即「本（官富）場鹽官」之意——記載鹽官嚴益彰（汴梁人，今河南開封）與友人何天覺（三山人，今福建福州）同遊南北佛堂，並記述修廟經過。這是九龍區域最早關於官富場且有明確年份的刻石紀錄。是為咸淳甲戌年六月十五日（即1274年7月20日）。¹¹

官富場與九龍城移民宗族的興起

官富場的設立，意味着最晚在南宋時期，處於嶺南的九龍地區已被納入宋朝的經濟管理體系，成為皇室財政收入的重要地點。官富場最初並非以民居市鎮的形態出現，而是帝國權力在嶺南沿海的戰略性存在——然而這段歷史卻由皇朝逃亡史詩揭開序幕，繼之以軍事與經濟管轄機構的設立。

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發達，九龍城一帶憑藉地利，與中國東南部沿海城市——尤其是海上交通要衝福建泉州，往來頻繁，商業蓬勃發展，也吸引了外地人士前來定居。¹² 前述石刻中提到的「土人林道義」，便是從福建移居而來的例證。林氏祖籍福建，世代從事海上運輸。至宋代，舉家遷至九龍彭蒲圍（位於新九龍，具體地點今已難考）。清初，彭蒲圍遭毀，林氏其後重建莆（蒲）崗村，再分支至竹園。¹³

至於吳氏，其一世祖吳居厚，為北宋嘉佑年間進士，其後人大部分散居於廣東各處，其中一位名叫吳從德，約於十四世紀初由東莞吳家涌遷至「官富司衙前村」。吳從德的三子吳成達，是為衙前圍吳氏的始祖。十七世紀時，部分吳氏族人移居沙田小瀝源，至十八九世紀

第四章

建築奇觀
民間智慧的極致呈現

由城寨街坊自行繪製的九龍寨城街道圖，可見像迷宮的佈局。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對香港（包括九龍寨城）及澳門，視之為歷史遺留問題，認為在當時條件下只能維持現狀，待時機成熟再作解決。¹

九龍寨城因此進入了一個所謂「三不管」的狀態。隨着寨城管治權問題一直懸而未決，三地政府均不能對寨城作出有效的管理，因而引起許多問題，例如水電的供應、公共衛生以及無牌商店的經營等。至於建築物群的無規則發展，不但讓人留下深刻印象，更成為了寨城別樹一幟的特色。

|| 第一節 || 港府管治的初步衝突

1960 年 5 月，香港政府發佈《九龍東北部發展草圖計劃》，當中涵蓋九龍寨城範圍。² 1962 年 3 月，港府派員進入寨城張貼通告，宣

佈將拆除寨城外圍的數條街道，³ 要求居民先行登記，以便日後遷徙至其他地區，受影響的民房約一百座，居民約 2,500 人。居民對此強烈反對，認為寨城管治權屬於中國，港府無權干預寨城內部事務。他們隨即成立「九龍城寨居民反對拆遷委員會」，表明將抗爭到底。⁴

根據港英政府前行政局於 1962 年 11 月 2 日訂定的一份備忘錄，前述《九龍東北部發展草圖計劃》中的「東頭村徙置區第二期計劃」涉及了清拆部分寨城，計劃日期由 1963 年 2 月 12 日至 20 日，而剩下的寨城部分，則留作兩年後公共房屋設施之用，可見港府早於 1960 年代已部署了清拆整個寨城的計劃。⁵

1963 年 1 月，中國外交部發出一份聲明，指出清拆九龍寨城嚴重侵犯中國主權。港督柏立基（Robert Black，1906—1999 年，任期 1958—1964 年）與英國外交部討論此事，提議擱置有關重建、徙置寨城及其居民的計劃。⁶ 九龍寨城於是進入了一個維持現狀期，三地政府

均沒有打算盡快解決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⁷ 寨城因此形成了一個「三不管」地帶的早期雛形，這種「三不管」的局面令香港政府的法律不易在九龍寨城執行。隨着寨城人口不斷增加，建築物的加建，非法行為包括黃、賭、毒的出現，它在一般人眼中變成了「罪惡之城」，甚至有人認為它是「世上最邪惡之城」。⁸

第二節 九龍寨城建築物眾生相

九龍寨城內的建築物亂象與香港的歷史息息相關。1943 年，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日軍佔領，日軍為了擴建啟德機場，將九龍寨城本來的城牆拆除。1949 年後，國共內戰導致大量難民湧入香港，九龍寨城成為他們其中一個落腳點，於是九龍寨城人口急增，促成了房屋的需求。

戰前的九龍寨城保留一些傳統的中式磚石房屋，後來因為戰後難民的湧入，香港土地不足，於是不同地區都搭建了不少臨時木屋及寮屋。1970 年代，大量內地人涌入香港，其中部分定居九龍寨城，寨城內房屋需求上升。不少發展商看到了商機，開始興建高層樓宇。九龍寨城在 1970 至 1980 年代的人口數量，一般估計為 27,000 至 40,000 人。⁹ 根據 1974 年香港政府的統計，在九龍寨城約二十八萬平方呎的面積中，不同類型樓宇及其他面積分佈如下（表 3）：¹⁰



1960 年代的九龍寨城。



1963 年的九龍寨城。



1970 年代，九龍寨城（照片中央）的違規建築及西頭村（下方）木屋區（來源：FCO 21/1968）。



1970 年代的九龍城東頭村道，右邊地盤為後來美東邨。



1960 至 1970 年代，由東頭村新區望向寨城東部的違規建築。



由西向東望的東頭村道店舖。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第五節 九龍寨城的無牌商業活動

由於警方在九龍寨城未能有效執法，黑社會的滲入便令寨城治安成為嚴重問題。根據傳教士潘靈卓憶述，其中一個幫會操縱區內老人街以東所有海洛英窟和妓院；另一個幫會操縱老人街以西所有鴉片煙窟、賭攤、小電影院、妓院、非法售賣狗肉的館子。³⁴

除了黃、賭、毒的活動（見第七章），在環境衛生異常惡劣的九龍寨城內，有不下數百間的山寨廠和食品工廠，當中包括：燒臘、魚蛋、糖果、玩具、塑膠、紡紗等，既為貧苦居民提供就業機會，同時為其時工業發展帶來貢獻。³⁵

此外，九龍寨城滿佈牙醫及診所。根據 Cathie Breslin 在 1963 年刊登的文章，寨城內有 60 間無牌牙醫及西醫診所。³⁶ 根據統計，在 1983 年 8 月九龍寨城內牙醫診所共有 97 家。³⁷ 1987 年 2 月出版的《城寨福利會訊》提及，自 1970 年代以來，曾到寨城普通科及牙科診所就診的有數十萬人次。³⁸

關於有大量非法的無牌牙醫及西醫診所在九龍寨城經營的原因，是由於居於寨城的移民人士中不少是擁有專業資格但在港未得認可，只能在寨城中無牌營業。早於 1940 年《牙醫註冊條例》通過時，部分未有註冊或未獲豁免註冊的牙醫不願意轉變工作，便無牌行醫，其中九龍寨城便成為他們的集中地，提供收費低廉的牙科服務。鑑於早年政府醫療系統未完善，這些診所為市民提供廉價的醫療保障。³⁹ 簡何巧雲對九龍寨城內無牌牙醫的情況有以下形容：

處於寨城的邊緣，面向「正常生活」地區則由無牌牙醫所佔據，他們以最低價錢提供服務，但病人的牙齒要承受一些風險。⁴⁰

此外，根據市政事務署一份 1978 年的內部文件，九龍寨城內共有 21 間無牌經營的食肆（包括四間賣狗肉的普通食肆），當中大部分位於龍津道及東頭邨道。21 間食肆中有九間是普通食肆，七間是小食食肆，兩間是食物製造工廠（即不設堂食，只供外賣或批發）及三間麵包店。除四間賣狗肉的普通食肆外，其他食肆的面積由一百平方公呎至四百平方公尺不等。該文件表示對無牌經營的食肆沒有採取法律行動（No legal proceedings instituted. Only periodically inspected and health advice given.）⁴¹

對於九龍寨城內的無牌商業活動，1986 年報章作了以下報道：即使醫療行業的反對，仍然有無牌醫生及牙醫經營，亦有食物加工店鋪被揭發是製造有害食品……基於複雜政治背景，政府有關部門對該地的大廈沒有管制……市政事務署也會調查食物中毒案件，但不會如香港其他地方般去檢查九龍寨城的食物業處所。那裏的食物業處所大多是無牌經營的。⁴²

就如處理違規建築物一樣，香港政府對九龍寨城內的無牌商業活動並沒有積極執法。對於港府這種「不管」的態度，在本書第七章會再加以討論。面對九龍寨城的發展落後及民生困難，港府沒有優先處理相關問題。然而，九龍寨城外的發展，卻是不一樣的風景。

第六節 九龍寨城周邊地區的發展

1916 年始，隨着九龍灣填海造地及啟德濱發展計劃的開展，九龍城的地貌出現巨變，而 1927 年空軍基地在啟德成立，九龍城進入了「航空時代」，該區樓宇的高度限制亦由此確立。⁴³

1930 年代後期，香港政府積極發展「新九龍」，將界限街以北至九龍山（飛鵝山）、慈雲山、雞胸山、虎頭山（獅子山）、煙墩山（筆



九龍寨城內的點心工場。



城寨內的一條街巷有燒臘舖和食品加工場。



寨城裏建於 1950 年代的天后古廟。



寨城裏的福德古廟。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